情报研究视角下智库情报能力建设路径*

■ 陈成鑫 曾庆华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与反恐怖学院 北京 102623

摘要：[目的/意义]大数据时代，从情报研究视角思考智库情报能力建设，可将情报研究的理念、方法、技术应用于新型智库，生产高质量思想产品，有效提高决策支持和服务能力。同时探索未来情报研究可能的发展之路。[方法/过程]通过研究大量文献，探讨情报研究与智库研究存在的关联和区别。根据两者之间的关联和区别，以优势互补的原则，合理运用情报研究的理论、技术和方法，总结新型智库情报能力建设路径。[结果/结论]提高新型智库情报能力和情报保障能力，需要加强情报需求的感知能力、动态情报收集能力、情报分析能力、情报平台的知识服务能力以及组织建设等。

关键词：情报研究 智库 情报能力 建设 路径
分类号：G250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18.21.013

从我国情报、智库发展的历史看，情报研究和智库研究始终存在交集，很多战略情报研究带有鲜明的智库资政色彩。其中，情报“耳目、尖兵、参谋”作用中的“参谋”就代表了决策咨询含义。20世纪80年代，国内情报研究学者提出：“情报部门应该成为思想库”的意见和建议[1]；1991年发布的《国家科学技术情报发展政策》指出：“情报研究是对情报的深度加工，属思想库范畴”[2]；孙成权等在《战略情报研究与技术预见》一书中指出：智库和战略情报研究都是为决策者提供决策支持和服务[3]；2017年10月在南京大学召开的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提出：为推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智库功能，将智库研究纳入大情报学的学科体系，将情报研究拓展为智库研究，将情报研究机构拓展为智库研究机构[4]。

随着新型智库建设的不断发展，从情报学视角、情报研究视角研究智库及其运行机制的成果日益丰富。通过利用文献计量学统计方法进行分析，《图书情报工作》《情报科学》《情报杂志》《情报理论与实践》等期刊均发表了较多有关智库方面的文章。由此可见，情报专家学者对智库研究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如王世伟分析了情报在智库中的前端作用[5]，李纲等人认为情报研究与智库建设在外在条件、内在机理和学科建设等方面都有重要关联[6]，张家年提出从情报视角研究提高智库能力体系建设[7]，袁建霞等人探讨了情报研究作为智库的组成部分可以在智库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8]。本文拟在情报研究视角下，通过研究分析情报研究和智库研究的相似点、关联关系和存在区别，按照“优势互补、系统集成”的思路，根据智库发展的需求特点，提出新型智库情报能力的建设路径，为新型智库更规范、更系统地使用情报研究成果，提升自身建设和决策咨询产品的生产能力提供情报支持。同时，通过研究智库的情报能力，可在一定程度上为情报学的科学发展确定方向和目标，解决情报学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问题，为情报学发展提供契机、注入活力。通过把智库建设的思想、方法与情报学进行融合、关联、嵌入，可实现二者合作共赢。

1 智库研究中开展情报研究的现实基础

钱学森认为[9]，情报研究是一项以情报学为理论基础的科学技术，不是一项简单的组织管理工作。情报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情报信息搜集、情报信息检索与存储、情报分析与研究、情报交流与服务等，对现代情

* 本文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8年基础科研费项目“大数据环境下基于用户需求的反恐智库平台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18JKF333)和“反恐怖情报体系构建与运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8JKF612)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陈成鑫(ORCID:0000-0001-9699-8626)，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通讯作者，E-mail：chengxinwujing8359@126.com；曾庆华(ORCID:0000-0002-1135-9030)，讲师，博士。
收稿日期:2018-04-11 修回日期:2018-08-01 本文起止页码:105-111 本文责任编辑:杜杏叶

报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当前很多情报学者对情报研究进行阐释,普遍认为:情报研究是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以问题为导向,通过获取的情报信息源,利用专业的理论和方法来揭示事物真相和规律的科学研究过程。总之,情报研究是包括情报学和情报工作的知识再生产过程,包括战略情报研究和战术情报研究。

智库研究主题内容具有战略性、预测性、服务决策等特点,这也是战略情报研究所要达成的效果。智库研究与战略情报研究的相似性,为智库开展情报研究和加强情报能力建设提供了基础。在战略性方面,一流智库主要研究战略问题,满足国家、各级政府的战略决策需求,发挥政策引领和决策支持作用。在美国,一流智库的许多研究主题涉及区域、国家甚至全球重大问题,具有政策宏观、范围广泛等特征,如彼得森国家经济研究所就专注于国际经济方面的战略研究[10]。在我国,各类新型智库主要为行政部门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强调突出战略思维,一般围绕政府、社会、公众关心的重点方向和内容,开展全面性、超前性、趋势性、建设性研究;在预测性方面,一流智库都非常关注预测领域的研究,通过运用科学的计算方法,结合各类专家的智慧分析,预测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以期得到相关政府的有效认可,并在业界拥有重要影响力竞争力。如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专注公共政策、金融贸易、技术项目及能源等领域研究,成功预见了一些重大问题[11]。20世纪 50 年代,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兰德公司成功预测了朝鲜战争中“中国将出兵朝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奠定了其在美国政界、军界的重要思想库地位[12]。

通过以上论述,智库研究作为应用研究,与战略情报研究一样,都不是纯学术研究,而是与实际问题紧密相联的应用研究。智库学者同情报研究人员一样,扮演着为决策制定者服务的学术专家角色。因此,智库研究和情报研究都必须持有立场并保持坚守,这为在智库研究中开展情报工作和研究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和必要性。

2　情报研究在智库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

由于情报研究与智库研究存在紧密联系,目前,情报研究在智库建设中承担举足轻重的角色。情报工作在智库产品产生过程发挥重要作用,情报学为智库建设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撑。

2.1　智库产品产生过程需要情报工作支持

智库产品产生过程与情报工作过程相似。智库产品一般遵循资料搜集、研究分析、方案拟定“三步走”的产生过程,与情报工作中的情报收集、情报分析与情报服务(评估与应用)基本对应[13]。智库产品的产生过程需要情报系统、情报收集和情报分析。

智库产品产生过程需要情报系统。2015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当具备的基本标准有 8 项。其中,第 6 项就是“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实践中,各类智库都非常注重资源建设和平台建设,著名智库一般都有专门的信息来源和网络。同时,在智库建设和服务过程中也会收集专属于本领域的独有信息资源,形成知识库、机构库,为其他机构或本机构相似问题研究提供独有数据信息支撑,如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14]、世界资源研究所[15]、兰德公司的“RAND State Statistics”[16]等。

智库产品产生过程需要情报收集。智库产品产生过程即是决策产品产生过程,智库产品产生一般是决策支持的前半程(决策支持的后半程,一般是智库产生影响力的过程)。情报收集对决策支持的研究自古有之,《孙子兵法》中就强调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代社会十分强调经济情报、竞争情报的收集,国家、跨国企业,要想在竞争中拥有主动权,同样需要足够的战略情报。因此,所谓情报是“源”决策是“流”[17]、成功的决策等于90%的情报加10%的直觉[18]等论述,都说明了情报收集在决策中的重要地位价值。

智库产品产生过程需要使用情报分析方法。随着用户对决策服务的要求日益增加,智库承担了很多重大问题的决策咨询,需要综合考虑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综合性、系统性,需要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情报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如回归分析、系统分析、预测分析、调查分析、时间序列分析、聚类分析等。许多智库在研究过程中,结合实际需要,不断丰富拓展原有情报分析方法,如兰德公司改进了德尔菲法、成本效用分析、启发式规划、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动态规划、系统分析等方法。

2.2　智库建设需要情报学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撑

由于“情报与决策”“智库与决策”两者之间存在天然关联性,智库建设需要借鉴情报学的相关内容。智库建设所需的优质资源、资源表示、知识发现、信息组织、信息计量分析等,与情报学的情报收集、整理、组织、分析等相关研究高度吻合。情报研究及情报学可为智库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理论、优质的信息资源、科

陈成鑫,曾庆华.情报研究视角下智库情报能力建设路径[J].图书情报工作,2018,62(21):105-111.

学的技术方法,所以情报学是智库建设的重要支撑学科。

当前情况下,随着智库的不断发展,智库建设面临理论构建和实践发展的双重任务。从学科建设角度出发,一些学者提出了构建"智库学",包括预测、咨询、评估、谋划、思想库、智囊团等六项关键内容[19]。结合情报的"耳目、尖兵、参谋"作用可以看出,新的智库学包含的智库建设、体系构建与情报学都密切相关。所以,情报学是未来智库学建设的重要支撑学科。运用好情报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构建新型智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情报研究与智库研究侧重点不同

虽然智库建设离不开情报研究和情报工作支持,当前部分情报机构也在积极向智库方向转型,但需要指出的是,情报研究和智库研究毕竟是两种不同的事物,还存有很大的区别。

3.1 研究内容上的区别

"情报"一词的概念解释最早出现于1915年的《辞海》,"军中集种种报告,并预见之机兆。定敌情如何,而报于上官者"。情报研究一开始就是有战争、竞争色彩的信息活动,是一种具有"敌我之分"的活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领域的细化,出现了诸如文献情报、技术情报、竞争情报等多种概念。但无论如何变化,不同领域的情报活动,都是将收集的各种信息经过研判、分析、整编而传递给用户的过程,情报活动的实施者是各类情报机构。情报研究的目的,是发挥"耳目、尖兵、参谋"职能,其核心是发挥预测预警预防、辅助决策功能。目前,情报研究则更多地发挥科研活动的"耳目、尖兵"职能,偏离甚至否定了"参谋"职能。但即使情报研究偏向于技术决策咨询、企业决策咨询等工作,与智库的公共政策决策咨询也不能完全等同[20]。情报研究更多的是提供战略情报、战术情报(政策情报、产业情报、竞争情报、技术情报、市场情报)和信息基础条件保障。情报研究一般包含四个方面:一是收集的各种信息和数据;二是收集、研判、分析、整编情报的过程;三是从事情报活动的机构;四是带有对抗、竞争色彩,具有知识性、时效性等特点。

"智库"最早起源于中国古代,如战国时期田齐的官办高等学府"稷下学宫"。现代智库则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以日本的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韩国的科技政策研究所、美国的兰德公司为主要代表。国内《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对智库界定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盈利性研究咨询机构[21]。智库研究的目的,是"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和决策咨询,通过各种研究成果和公共媒体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社会舆论"[22]。智库的作用和价值,在于其产品成果对人员、组织、政府甚至国家的思想、决策、政策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力[23]。生产智库产品、智库产品产生影响力,是智库研究的两个过程。与情报研究相比,智库研究一般具有前瞻性、资政性、独立型、自主性和非盈利性等特征。智库研究内容包括:一是智库本身的运行和研究;二是研究公共政策的产生规律并影响公共政策的产生,对公共政策的产生建言、发声。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智库比情报机构更加关注结果的使用和效果。可以说,情报研究是智库研究的前端,而智库研究是情报研究效果的延伸和结果的进一步验证。

3.2 理论体系上的区别

1945年,美国学者范内瓦·布什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诚如所思》(As We May Think)文章,成为情报研究的开山之作[24];在国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情报研究设立了情报学学科,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从目前看,智库研究还尚未形成学科理论体系。

美国情报学家约维茨曾提出"广义情报系统",该系统基于决策论角度,认为情报是"对决策具有价值的数据资料",对情报和决策进行了联系,可以作为智库研究和情报研究的通用理论。但从实际看,无论如何联系,情报研究更注重信息以及信息的整个流程,处于决策支持的前端;而智库研究则处于决策支持的后端,是以用户为中心,更注重信息和智库产品的价值和效率。其中,情报研究主要围绕信息和信息活动的过程来提炼理论,集中于信息的生产、加工、传递、使用等,如布拉德福定律、洛特卡定律、齐普夫定律、文献增长律和老化律,以及前苏联科学技术情报所所长米哈依诺夫的科学交流理论、美国情报学家约维茨的科学决策理论等;智库研究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公共政策的作用发挥上,源自于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公共管理、心理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如政策过程理论、精英理论、科学咨询理论、决策理论、认知心理理论等。因此,可以看出,情报研究是决策的基础和前提,而智库研究是决策结果的推广和验证。

3.3 研究方法论上的区别

情报研究具有较为完善的方法论体系。情报需求

分析，有问卷法、访谈法、头脑风暴法等方法；情报收集，有人力情报获取、数据挖掘、搜索引擎、网站监控等方法；信息组织，有信息自动分类、信息标引、本体构建等方法；情报分析，有文献计量法、网络计量法、统计分析法、竞争情报分析等方法；成果评价，有层次分析法、加权评分法、模糊评价法、德尔菲法等方法。这些方法，都是产生情报增值的基础，是对信息数据的有效整合、挖掘。

智库研究方法论体系，主要基于对咨询效果的评价，包括智库影响力的测度方法、决策咨询的方法。其中，影响力的测度方法包括直接测度法、间接测度法。直接测度法，包括获得领导批示的次数、被领导引用的次数等。间接测度法，包括媒体引用次数、接受媒体采访次数，网络上被浏览、下载、转载、引用次数，微信公众号的关注数量等；决策咨询的方法，有定性方法、定量方法。定性方法，包括系统分析法、德尔菲法、头脑风暴法、访谈法等。定量方法，包括各种计量方法、数据建模挖掘方法。智库的决策咨询和发声、建言职责，决定了其被决策者的关注程度是成功的重要标准。同时，为更好地提供决策咨询和思想产品，智库研究还会广泛借鉴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

4　加强新型智库情报能力的建设路径

通过上面论述可知，情报研究在智库建设很多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新型智库需要继续加强需求判断、情报收集、情报分析等情报能力建设。同时，情报研究和智库研究在研究内容、理论、方法论方面存在不同，为发挥情报研究在智库研究中的作用，除加强情报能力建设外，还需加强平台建设、组织建设等情报保障能力建设，以便更好地使用情报研究理论和方法论。智库研究要与情报研究优势互补，合理使用情报研究的相关理论方法，加强智库的情报能力、情报保障能力，不断提升智库产品的影响力。本研究的逻辑关系见图 1。

4.1　加强新型智库情报需求的感知能力

决策科学倡导“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智库以改进决策制定为目标，所有活动都是围绕这一目标而开展[25]。目前，新型智库决策面对的社会环境更加复杂，面临信息爆炸、信息安全、信息污染等各类问题，对智库如何更好地寻找“问题目标”提出了巨大现实挑战。克拉克在《情报分析》一书中，提出了面向目标的情报分析，其基本思想是：情报工作的各个环节运作合理固然重要，但情报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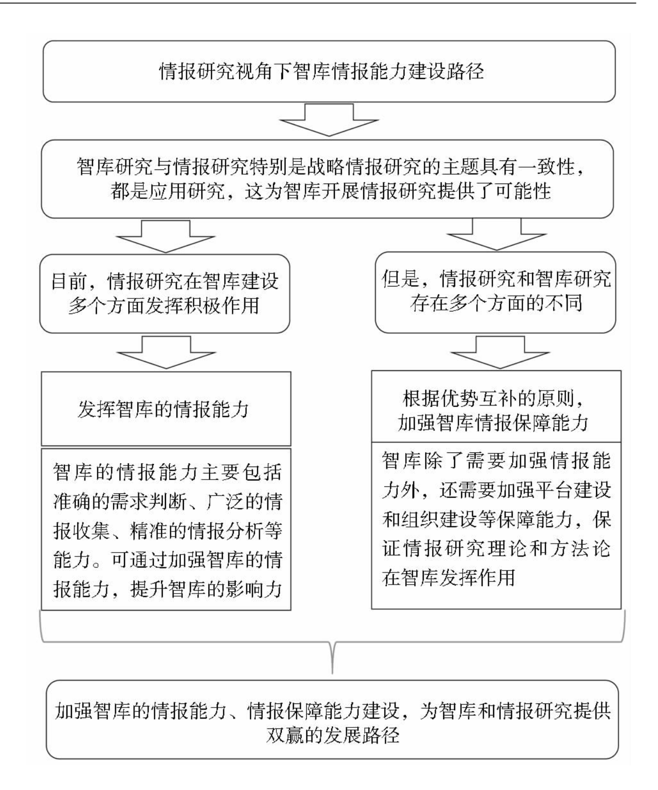


图 1　逻辑关系

成功的关键取决于对情报需求的准确挖掘和刻画[26]。因此，加强智库情报需求的感知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要有问题意识。通过对内外环境中的情报信息进行收集、分析、研判、评估，发现隐藏的深层次问题，及时做出预测和咨询服务，在事件临界发生之前或之后准确、及时地提出战略对策；其次，要持续、动态关注问题。用全局性、战略性、综合性视角进行全事件链审视，把各类现象进行串并关联，注重把握关注问题实质；第三，要细化分解问题。把笼统、模糊的情报需求转化为需要决策咨询的具体问题，为决策者提供各种可以把握的选择方案，并提供这些方案全面客观的解答。在此过程中，智库需要与决策者保持有效沟通，全程了解真实意图目的，适时通报对各个方案的准确判断。如果智库与决策者意见不一致，要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

4.2　加强新型智库动态情报收集能力

信息资源是情报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可靠准确的信息资源也是智库生存发展的首要条件。国外有些著名智库，就是从图书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如胡佛研究院。大数据环境下，我国新型智库要高度重视资源建设，只有具备坚实的信息资源基础，才能为决策咨询提供更好服务。

首先，要加强情报收集能力。大数据环境下，决策

所需数据涉及领域众多、规模巨大、结构多样、时效不一。智库需要加强网络数据采集、多源数据智能存储、异构数据清洗、数据动态更新及管理系统研究等,提高情报收集能力,为决策支持提供实时、动态的信息资源;其次,要建立知识库、机构库。通常智库研究集中在某一系统或领域,专业性较强。在建设和服务过程中,要注意收集专属于本系统或领域的独有信息资源,构建知识库、机构库。同时加强收集知识库、机构库中相关案例的中间数据,形成完整的事件链、时间链,以便全景展示。如兰德公司在信息收集过程中,建立了许多专有数据库,供自身研究使用。美国 START 联盟从 2011 年开始为全球恐怖数据库(GTD)收集相关案例,作为反恐研究的数据来源和平台[27];第三,要加强收集智库的智力资源。除常规情报收集外,要把不同专家或用户形成的经验总结、态势判断和战略规划实时输入智库的知识库、机构库。加强与相关同类智库的交流合作,进行情报互换,不断丰富智力资源,使智库数据更加丰富合理。

4.3 加强新型智库情报分析能力

大数据环境下,智库提高情报分析能力,需要在分析理念、方法、技术、保障等方面提高技能。

智库的情报分析需要进行关联分析和因果分析。加强大数据环境下的情报分析能力,建立异构资源的关联分析,为智库决策支持提供多种信息和多维情报分析角度,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避免关键信息的缺失,提高决策结论的合理性。同时,智库的决策服务需要提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结论,还需要以相关关系为引导,寻找因果关系。

新型智库的情报分析要使用现代科学方法。要加强定标比超法、SWOT 方法、情景分析法等竞争情报分析方法,加强文献计量法、网络计量法、统计分析法等计量分析方法,加强层次分析法、加权评分法、模糊评价法、德尔菲法等成果评价方法。可充分借鉴国内外相关智库的成功方法,如兰德公司开发的各类研究方法已经被各国智库广泛学习借鉴,其研制的"计划、程序和预算编制系统"(PPBS)已被美国联邦政府应用于军事预算、联邦政府预算的编制[28]。

新型智库的情报分析要有强大的技术和平台支撑。大数据环境下,除依靠原有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外,还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数据处理技术和平台。利用数据库技术、分析预测软件、网络平台、数据挖掘、计算机仿真等方法手段进行情报分析,解决复杂问题,提高工作效率。如德国 Fraunhofer 应用信息技术研究所(FIT,Institute for Appli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开发的协同工作基本支撑系统(BSCW,Basic Support for Cooperative Work),可以实现网上协同工作[29]。

4.4 提高新型智库平台知识服务能力

新型智库需要提高知识服务能力,从各种显性、隐性知识资源中,有针对性地提炼相关知识,为智库的决策提供知识发现、知识交流、自主服务、互动共享的服务机制。

智库平台需要加强中间数据的管理。智库决策的各种典型案例或者决策的中间过程、中间数据,可能对用户更有价值和意义。通过对各类智库平台调研发现,资料的收集更多地集中于最终成果,而忽略了对中间数据的收集和维护。如果让用户了解这些中间报告、数据、推理过程,可以优化决策过程,完善思想智慧的产生过程。因此,新型智库平台需要规范中间数据的管理、组织、存储,规范数据格式及转化、元数据、数据集标识和引用,对数据进行全方位关联,不断产生增值效果[30]。在数据存储基础上,进行多角度、有序化标注,为多途径的数据浏览检索提供支持,个性化地推送给相关用户,提高利用效能。这也将是智库情报平台未来发展的重要生长点。

智库平台需要对用户交流共享提供引导,营造良好的智慧服务氛围。智库比较常见的交流方式有,通过"研究人员会议"开展头脑风暴,收集各类人员的观点想法;邀请政府首脑、高级政要、著名学者、知名记者作报告,帮助研究人员拓展思路、深化研究、激发灵感。新型智库应依托平台,引导用户进行交谈、交流、交互、分享,进行信息标引标注,点赞评价,激发灵感,协同解决问题,形成群策群力,产生 1+1>2 的信息增值效果。通过交互性、去中心化、实时动态的网络信息传播途径,依托微信、微博、各种"群"等交互式在线交流功能,结识同行,分享经验,拓宽思路。通过精准推送,实时发布学术会议、专家演讲等音(视)频资源,加快知识传播,助力产生思想火花,成为智慧服务的主要场所。

4.5 加强新型智库组织建设

从情报研究的共享和交流角度看,扁平化的组织结构,能够使智库研究人员更好地直面决策者,把更多精力放在如何满足用户需求上,而不是如何应对自己

的管理者。为防止行政化干扰,形成“短、平、快”的决策咨询环境,需要压缩管理层级,从而能够更好地领会决策者意图,使智库决策咨询工作更加符合决策者的真实需求。因此,扁平化的组织架构,对智库的组织管理提出了严峻考验。

首先,作为智库管理者要熟练掌握各类数据库、资源基础和技术手段,善于沟通协调,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其次,智库研究人员直接面对决策者,需要培养智库研究人员与决策者之间的有效沟通、互动能力。智库需要为决策者提供备选方案,用科学合理的观点去影响、引导决策者的思路和理念。智库不因决策者的喜好去顺从,不应该给决策者的观点、言论做注释,而应该在观点、思想、视野和方法等各个方面超越决策者的视界眼光。

5 结语

综上所述,新型智库要具有时代责任和担当,站的更高、看的更远、想的更深、做的更实,超越现实的、功利的、场景性的约束,研究宏观性、超越性、长远性、全局性问题,并把情报研究的各种理念、方法、技术、平台有效运用于智库研究过程中,提出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建议。注重加强新型智库的情报体系、决策咨询体系的并重发展,加强决策咨询过程中情报研究体系的构建,使智库能够始终以独立、中立的立场影响决策。

参考文献:

[1] 梁战平. 我国科技情报研究的探索与发展[J]. 情报探索,2007(7):3-7.
[2] 包昌火,李艳,王秀玲,等. 竞争情报导论[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3] 孙成权,曹霞,黄彦敏,等. 战略情报研究与技术预见[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6-8.
[4] 初景利. 新时代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新定位与新认识——“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2017)”侧记与思考[J]. 图书情报工作,2018,62(1):140-142.
[5] 王世伟. 试析情报工作在智库中的前端作用[J]. 情报资料工作,2011(2):92-96.
[6] 李纲,李阳. 情报视角下的智库建设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2015,59(11):36-41,61.
[7] 张家年. 情报视角下我国智库能力体系建设的研究[J]. 情报资料工作,2016(1):92-98.
[8] 袁建霞,董瑜,张薇. 论情报研究在我国智库建设中的作用[J]. 情报杂志,2015,34(4):4-7.
[9] 卢胜军,赵需要,栗琳. 钱学森科技情报理论体系及其意义[J]. 情报科学,2012,30(9):1418-1423,1435.
[10] 任福兵. 美国一流智库发展规律与特征研究——以 6 所美国一流智库为例[J]. 情报杂志,2016,35(10):18-25.
[11] 朱峰,王丹若. 领导者的外脑——当代西方思想库[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12] 吴志革. 情报与决策[J]. 兵工情报工作,1982(5):51.
[13] 邹逸安,何立坚. 国外思想库及其成功的经验[J]. 中国科技论坛,1991(4):58-61.
[14] 黄建海. 当代实用信息源分类研究[J]. 中国信息导报,1995(5):18-20.
[15]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WRI). about WRI[EB/OL]. [2018-06-11]. https://www.wri.org/about.
[16] Rand corporation. resources, databases and tools[EB/OL]. [2018-06-11]. http://www.rand.org/pubs/tools.html.
[17] 范炜,胡康林. 面向突发事件应急决策的情报支撑作用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2014,58(23):19-25.
[18] 高金虎. 美国战略情报与决策体制研究[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07-211.
[19] 周小毛. “智库学”:范畴、规律与框架[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2-22(016).
[20] 周晓英,崔佳佳,唐宇萍,等. 情报学的起源与方向——从布什的《诚如所思》谈起[J]. 情报科学,2004(2):129-132.
[21] 金学慧,夏勇琪,付宏. 情报机构参与智库建设的 SWOT 分析与策略选择[J]. 智库理论与实践,2016(4):64-71.
[22] 杨雪. 建设新型科技智库,怎么破题? [N]. 科技日报,2015-04-05(002).
[23] 朱旭峰,苏钰. 西方思想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基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分析框架构建[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12):21-26.
[24] 王孟,王欣. 公安智库的建设与创新研究[J]. 公安教育,2015(11):50-55.
[25] 陈振明. 政策科学与智库建设[J]. 中国行政管理,2014,347(5):11-15.
[26] 罗伯特·克拉克. 情报分析:以目标为中心的方法[M].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56.
[27] The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7[EB/OL]. [2018-06-13]. http://visionofhumanity.org.
[28] 黄如花,李白杨,饶雪瑜. 面向新型智库建设的知识服务:图书情报机构的新机遇[J]. 图书馆,2015(5):6-9.
[29] 赵凡,冉美丽. 情报服务实践中的协同情报研究理论探讨[J]. 图书情报知识,2007(2):65-68.
[30] 安楠,祝忠明. 智库信息组织策略及其在大数据环境下的挑战[J]. 智库理论与实践,2017(3):25-35,50.

作者贡献说明:

陈成鑫:负责论文主题选取、总体框架设计、论文撰写;
曾庆华:负责资料收集整理、文献调查、后期修改。

陈成鑫，曾庆华.情报研究视角下智库情报能力建设路径[J].图书情报工作,2018,62(21):105－111.

The Path of Intelligence Capability Building of Think-tank in View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

Chen Chengxin　Zeng Qinghua

School of Investigation and Counterterrorism,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2623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 the era of big data, thinking intelligence capability building of think-tank in view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 can apply the concept, method and technogy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to the new think-tank, and produce high quality thought products, improve the ability of decision-support and servic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beneficial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 the future. [**Method/process**] Through the literatures studying,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 and difference between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think-tank research. Based on the relation, difference and the principle of complementing each other with advantages, the theory, technology and methods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 are reasonably used to summarize the path of intelligence capacity building of new think-tank. [**Result/conclusion**] In terms of improving intelligence capacity and intelligence support capacity of new think-tank,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following abilities, including the perception of information demand, the ability of dynamic information collection, intelligence analysis, platform knowledge servi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

Keywords: intelligence research　think-tank　intelligence capability　building　path